

# 德鲁克社会管理理论及其对我国现阶段的启示

宫向阳<sup>1</sup>, 李兰芬<sup>2</sup>

(1. 苏州科技学院 党委宣传部, 江苏 苏州 215009; 2. 苏州大学 伦理道德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以自由的功能性社会、生态性社会系统、创新性社会管理等基本范畴建构起来的德鲁克社会管理理论,既彰显了德鲁克宏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功底,又反映了德鲁克超越技战术层面的宏观战略管理理念。分析、解读德鲁克社会管理思想,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具有重大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德鲁克;功能性社会系统;创新性社会管理;生态性社会系统理论;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

**[中图分类号]**D035-0;C9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2)04-0013-07

管理思想家德鲁克十分重视社会建设,主张以“自由的功能性社会、生态社会系统以及社会管理创新”等理念范畴应对充满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转型,并建构富有生机活力和平稳发展的新型社会。鉴于德鲁克的政治立场及其理论贡献,学界尊称德鲁克为“社会生态学家”。本文将从实现自由的功能性社会、建构生态性社会系统、注重创新性社会管理等三个方面来解读德鲁克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思想,以期推进和拓宽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

## 一、实现自由的功能性社会

### (一) 自由的功能性社会阐释

德鲁克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尽管他认为“我们无法给社会一个标准的定义”,“定义社会和定义生命一样难以做到”,但是,“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社会”<sup>[1]10</sup>。关于何为“自由的功能性社会”,他在《工业人的未来》、《公司的概念》、《下一个社会的管理》、《功能社会》、《社会的管理》等著作中都有深入探讨,并多次做过概念性或描述性的文本解释。德鲁克认为,要在一个多向维度的社会内部保持平衡,“社会就必须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它必须给个人赋予社会身份和功能,而其权力必须被承认具有合法性”<sup>[2]19</sup>。前者建立社会生活的“基本骨架”——社会的宗旨和意义,而后者则为这一骨架“丰满血肉”——给社会赋形并创造社会制度。“身份”关注人的存在(being),“功能”则关注人的行事(doing)。要满足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涉及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即每个人都有最明确的社会地位,并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力,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一个社会,除非赋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除非其社会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

“合法性”是德鲁克“功能性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合法性的权力可定义为一种政治统治权,该统治权的正当性根源在于社会的基本精神特质。”<sup>[2]23</sup>德鲁克认为,一个社会有很多种权力在

**[收稿日期]**2012-03-28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思想政治教育及管理研究项目(SGSY2009YB277)

**[作者简介]**宫向阳(1968—),男,安徽含山人,苏州科技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哲学、管理学、新闻学;李兰芬(1950—),女,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管理哲学。

发挥作用,其中政治统治权是决定性的社会权力。诸多权力可能与社会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相互矛盾,比如,在一个标榜自由的社会里到处充斥着不自由的制度,在一个倡言平等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不平等的现象出现,但是,只要起决定作用的政治统治权在其理想和诉求中不放弃对自由、平等和崇高道德的追求,只要其制度设计和运转机制是为了实现这些正义的理想和目标,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说,这个统治权力具有合法性,这个社会就能够作为一个自由、平等和道德高尚的社会而发挥功能。

“人类需要社区,也还需要社会一个体从社区中获得地位和归属感,在社会中发挥功能。”<sup>[1]10</sup>早在1887年,社会学家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ennies)就在《社区与社会》中提到了这一观点。一百多年以后,腾尼斯所希望保留的社区,也就是那种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有机制”(organic)的社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鲁克意识到,腾尼斯希望回归到前工业文明社会状态不过是一种幻想,但是,腾尼斯关于人需要在社会和社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体现人在“社会性意义上的存在”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也成为德鲁克建构工厂社区自治理论以及功能性社会理论的基础。

德鲁克认为,自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功能性的社会,而功能性社会必然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二者密不可分。19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就在于它成功整合了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带来的经济贸易蓬勃兴起的现实,并且一度容纳了新型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成长。但是,当现代资本主义呈突飞猛进之势席卷整个欧美的时候,旧有的重商主义经济社会的框架无法满足工业体制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变迁,社会变革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 (二)“身份”赋予与“功能”发挥

功能性社会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身份”、“功能”和“合法性”。“身份”与“功能”纯粹是社会学的概念,反映出德鲁克绝非把社会管理研究局限于组织内部和管理的具体规则,而是更多地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社会管理问题。

德鲁克认为,对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而言,个人应该拥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只有当社会能够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使个人具有身份和功能,是社会应该做的事。如果社会丧失了赋予个人身份与功能的能力,就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乌合之众似的群氓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它必定会陷入动荡之中。

德鲁克把“身份”与“功能”置于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内,认为“身份”与“功能”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交融整合符号化了,它表达了根据社会话语言说的个人意志以及根据个人话语言说的社会意志,就使群体视角中的个人存在和个人视角中的群体存在变得可以理解且合理化。

一是从个人的视角看看社会。就个人而言,具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则意味着社会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如果缺乏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则社会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当社会的观念、目标、意志和理想从个人的角度看有意义时才存在所谓的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有了这种意志和目标的认同,就不存在非社会生活的个人生活,也不存在非社会目标的个人目标;反之,对既缺乏功能又缺乏地位的个人而言,社会成了自己的“敌人”,它既不合理,又不可捉摸,也毫无意义。对他们而言,社会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存在,他们只是被宿命般的“超人力量”左右了生活、掌控了生计。在这样的所谓社会面前,他们除了深深的被剥夺感外,只剩下无能为力和叛逆绝望。

二是从社会的视角看个人。个人应该拥有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其实现的前提是个体成员的观念、目标、意志和理想必须与社会的观念、目标、意志和理想相符合和统一<sup>[2]21</sup>,否则,社会就无以理解也无以接纳于他。那些脱离社会、未被社会融合的个人,不仅仅显得非理性,而且对社会构成危险,成为一种起消解作用的、具威胁性的、幽灵般的破坏力量。“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正是那些很可能被迫脱离社会的人群——失业者和大学生,他们引爆了众多美国民众对现实的不满。”<sup>[3]</sup>

## (三)自由的功能性社会理论评价及其中国境遇

德鲁克自由的功能性社会思想源于他对东西方社会历史的考察与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

强调“身份”与“功能”的存在对功能性社会的意义,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尽管种姓之间差别很大,但并不妨碍印度社会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因为通过将群体和个体融入宗教意志之中,印度种姓制度体现了一种群体与个人之间明确的功能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在赋予不同等级明确且相对固定身份的同时,又通过科举制度等制度化设计为底层向高层流动预留了上升的通道,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事实表明,在一个迁徙频繁、身份常相变更的社会中,重要的是地位必须明确、功能易于理解并且意图合乎理性,而不在于身份是否固定不变。

然而,自由的功能性社会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德鲁克过于强调社会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政府及政治权力的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自治传统,始终提倡分权与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和国家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犯;二是德鲁克像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一样,对国家政权的过度强大始终持警惕态度。实践证明,现代政府和政治权力在经济发展和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也是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不断徘徊调整的根源所在。晚年的德鲁克承认政治政府的重要作用,这应该视作他在功能性社会建设理论上的一种反思与回归。

将社会和社会建设置于优先考虑范畴,是德鲁克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使然。保守主义理论倾向于社会优先、社会在前。较之于政府施政而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更重要。因此,社会价值观、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组织中的个人、社会维系及其正常运转、社会的动荡与变迁等,始终成为他观察与思考的重点。社会必须赋予公民以身份,必须使公民通过一定的途径发挥其功能,这是公民到达自由的必然路径,也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

德鲁克“自由的功能性社会”理论为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市场经济改革空前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以人为第一资源的各种经济要素的重新组合,释放出强有力的创新动力。如何对待新出现的巨大的流动性人口和待业人群,如何照顾那些在改革中被边缘化的群体,给予其应有的身份,赋予其“参与”和“共享”的权利,如何畅通阶层之间的沟通和流动渠道,防止“阶层固化”和“社会血管堵塞”,如何借助社区建设这一新型平台,将公民特别是新的社会群体成功整合到社会中来,都值得我们深思。尽管德鲁克所描述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与我国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新型社会群体的出现、公民身份的变化等仍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由于身份变化而处于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问题,农民工进城后如何有效地赋予其“身份”,真正使之融入城市环境中,如何发挥教育在填平社会鸿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等,都需要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找到解决的途径。

## 二、建构生态性社会系统

德鲁克“生态性社会系统”理论的要义是:现代社会由组织构成,组织是社会的“器官”,不同性质的组织宗旨有别,“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使命和某种特殊的社会职能而存在的”<sup>[4]13</sup>。同时,管理是组织的“器官”,每一个组织通过卓越的管理发挥其功能,产生必要的绩效,相互协同作用,才会形成一个运转良好的“生态社会系统”。

### (一) 生态社会系统中的多元组织

组织置身于社会之中,多元组织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我关注的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态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这个术语虽然是我自创的,其实它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曾有过辉煌的历史。”<sup>[5]</sup>作为生态系统里的一员,组织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居于何种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它的功能发挥对社会生态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反之,社会生态环境对组织的运行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器官并非为自己服务,它必须为整体贡献力量,这就是德鲁克“组织的目标在组织之外”的生物学解释。因此,一个组织的性质和影响,必须在宏观的社会生态系统下来考察;断言一

个社会是否为自由的功能性社会,也必须以其中不同性质的组织作用的发挥情况为依据。一个缺乏良好组织的社会不可能成为自由的功能性社会,同样,在一个病态社会中,任何组织都不会繁荣兴旺。

德鲁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分析了社会生态系统下多元组织存在的必要。从理论上讲,德鲁克属于重视社会目标实现的传统保守主义者,他反复言说、念兹在兹的是社会价值、社会权力、社会制约、社会道德、社会愿景。他最为担忧和始终警惕的是,由于一种力量的独大,社会均衡遭到破坏,因而导致自由的功能社会的解体。他始终强调自由选择的重要意义,反对专制暴力和对人的奴役。德鲁克以为,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要件是多元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多元组织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功能性社会的终结。主张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并存,是德鲁克保守主义政治观的外在体现。德鲁克对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公司企业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了其早期的代表性著作《公司的概念》,对公司的属性、公司的结构、公司的治理等做了开创性的梳理和总结并得出结论:现代公司企业是通往功能性社会的必然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后期德鲁克的思想有所变化,他对 20 世纪的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探究结果修正了早先为企业所下的结论,他又把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和价值伦理的希望寄托于非营利组织的卓越表现。随着 20 世纪新的社会组织(如医院、大学、工会、社区组织)的不断出现和发展壮大,德鲁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对这些组织的研究之中,他认为,正是大量新组织的出现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建构一个新型的现代功能性社会才会变得可能,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重建多元化社会的进程。

## (二) 组织管理与生态绩效

多元组织的存在并非能自动地形成生态社会系统。德鲁克反复强调,组织的首要目标是要取得绩效,没有绩效的组织,无论是公司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既无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更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社会系统。因此,检验组织的成功与否就是其绩效精神,即取得杰出绩效的能力。与此相对,衡量社会、社区、家庭的成果标准是生存而非绩效。处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组织,其绩效的关键是创造能量。企业运用公司法则和市场手段整合资源,获取远超其投入的经济效益;非营利组织通过美好的价值观和卓越的管理吸引人们志愿参与,以实现其改造人和社会的愿景。“对于社会而言,组织掌握着执行某项任务的权力,组织必须使它在寻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地履行社会义务,使社会得以功能健全地运行。”<sup>[6]</sup>

组织绩效受组织中个人绩效的支配。机构的宗旨是组织人们为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而努力,并且以实际来检测,组织的作用不是使组织中的人的力量呈现简单的叠加或相互抵消,而是远远大于个人力量的总和,组织的目标是使平凡的人有能力从事不平凡的工作,“组织的法则乃是集中力量”<sup>[7]</sup>,这是组织绩效管理的真正意义所在。因此,应该通过有效的管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工作绩效,形成群体的力量和社会凝聚力。

组织取得绩效的关键是组织文化所体现出来的责任感、价值观、使命精神以及由此凝合成的社会意识与社会价值观,这也正是德鲁克所谓组织、社会的合法性权力基础的本质所在。如若公司只关注利润而不顾产品质量和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那么,它必然是一个危害人类的经济“怪物”;如果政府只关心 GDP 的增长而罔顾公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提升,则政府必然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因此,管理者必须既关照组织内部,又始终把目光投向组织外部;既关注产品质量,也要关心凝聚在产品中的道德因素;既重视事物的功效即发展的结果,也不能忽略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公平与正义。实现有效的组织管理,管理者必须发挥伦理领导力,以价值观、愿景和道德力量示范众人,引领企业。德鲁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的价值观,并非出于道德的泛化,而是坚信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使社会因之获益的同时,同样使企业获益,组织绩效与社会生态绩效达到有机的统一。将解决社会问题化作企业自身的机遇,正是德鲁克解决价值和利益矛盾冲突的一种切实努力。

## (三) 生态社会系统理论评价及其中国意义

德鲁克“生态社会系统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他以“生态均衡”的视角看待社会的应然状态(即

健康和谐、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强调人类及其组织共生于一个生态系统当中,不同的组织发挥各自的功用,前提是组织要有显著的绩效,组织的价值观必须与社会总体的价值观相一致。他认为,这既是组织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组织取得合法性权力的基础。

这一理论为我们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明晰的目标。事实上,当下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主张缩小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城乡差距,若要做到这些,首先就要形成权力制约、社会监督、责任共担、协力同心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因此,构建一个生态型、均衡型社会系统的意义重大。但是,在寻求实现生态社会系统的路径上,德鲁克先是寄希望于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发挥,后是把目光投向追求价值目标和卓越管理的非政府组织,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一路线图并未将我们带到“理想的彼岸”。但是,德鲁克关于“每一个社会组织必须有绩效精神,必须有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诉求”的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当下的中国社会生态系统呈现政府强大、社会弱小,社会组织参与度和作用力发挥都十分不足的状态。以政府主导为显著特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模式既有成功的大量范本,也存在一系列的深刻困境,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容易遮蔽一些社会问题并导致对政府主导模式的路径依赖。社会治理较于经济建设更复杂、更敏感,牵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德鲁克的“生态社会系统理论”启迪我们,应该用更加均衡、更加协调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和社会组织,加大社会特别是社会组织建设的力度,使之规范化并具有参与社会建设的合理空间,激发民间的活力,使中国在获取经济硕果的同时,也能建设一个具有健康的主流价值和更高的组织效能的新型社会,一个更具自治精神与自治能力的现代公民社会。这一社会的组织与公民,将摆脱支离破碎和被动依赖,更为积极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成为一个良好的生态社会环境的守望者和建设者,并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体,多元组织共建、社会各方参与的“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从这一意义上说,加强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建设不仅是“社会善治”的需要,更是建设民主法制与和谐社会的长远根基。

在政府力量强大的现状下建设生态和谐社会,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亦有其必然性和优势:一是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基础和社会组织基础使然;二是在应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共识;三是具有历史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我们描绘了当前社会建设的路线图:“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

### 三、注重创新性社会管理

创新是德鲁克管理理论的实践机制,德鲁克社会创新理论的本质就是管理创新。实现运转良好的功能性社会目标,建构生态性社会系统,其必然路径是社会管理创新。创新作为未来指向的维度,却发轫于德鲁克对过去的总结和分析,奠基于他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观念中,概而言之,是基于变革视野的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延续和变动间找到平衡。

#### (一) 基于变革视野的社会管理创新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20世纪那样经历了如此多、如此激烈的社会转变。德鲁克认为,无论是自由经济社会还是西方政治政府,无论是技术还是产业组织方式,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资本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他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本书问世以来所发生的真正的沧桑巨变就在于社会本身”<sup>[8]</sup>,“在大家畅谈新经济时,我开始察觉社会正在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越来越多”<sup>[1]14</sup>,“如果20世纪是社会变革的世纪,那么,21世纪需要成为社会和政治创新的世纪”<sup>[4]273</sup>。

人们一般认为创新就是技术创新,但德鲁克的创新概念更为丰富。在他看来,“创新不仅仅包括

知识创新(如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而且也包括经济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和社会创新,包括一切能够把经济的、社会的,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源转变为新的生产力,从而创造财富的过程”<sup>[9]</sup>。德鲁克特别重视社会管理创新,如报纸和保险业的发明,分期付款方式的出现,等等。“社会创新——正如本章试图阐明的那样——将会比任何科学与技术的发明产生更大的重要意义与更加广泛的影响。”<sup>[4]</sup>7 德鲁克认为,社会管理创新较于技术创新更加重要,因此,真正的创新是由管理实践引发的,真正的变革是社会的变革。

## (二) 在延续和变动间寻找平衡

面对社会变化甚至社会动荡,往往出现革命的实践和改良的实践两种实践取向。革命的实践强调以暴力斗争的手段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改良的实践主张借助优秀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在原有的社会基础上不断创新,主动创新,实现社会的稳健发展。社会管理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的实践观,具有继承性和渐变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sup>[10]</sup>。德鲁克作为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主张“管理创新”、“渐进的变革”,通过长久的努力和不断创新逐步改变社会的基础,以求得在保持传统与实现变革之间动态的平衡,而不是完全否定过去和现实,把所有的传统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在我看来,将来的某一天,和平得以在历史的旅程中实现只能是通过改车换骑,而不是结束我们的旅程或者重新开始我们的旅程。”<sup>[2]</sup>6

从社会变化到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善治的实现路径,德鲁克寄希望于“在延续和变动间找到平衡”。德鲁克所信服的政治学家柏克说过:“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在延续和变动间找到平衡。这样的精神,随即成为我的政治观、世界观和日后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sup>[1]</sup>10 一方面,管理创新和社会创新源于对过去的批判性继承,这种批判性继承既非完全肯定过去,也不是彻底否定历史。德鲁克既主张敢于抛弃不合时宜的、错误的理念和价值观,改变甚至取消那些不具有生产力、在体系内起阻碍作用的组织和计划,也并不讳言他对历史和经验中业已被证实的有益传统的继承和维护。这一传统植根于他对人的本性、社会的终极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正义性等深层次的认知中,植根于他对 20 世纪人类经历的巨大灾难的历史反思之中。德鲁克“在传统中寻找创新的工具”的思想,就是传统延续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德鲁克又绝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反思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以创新而不是激进的方式对传统加以变革。由量的变化造成质的转变,以企业家精神善抓机遇并实现战略性转变,这些思想反映在他的大部分关于企业管理、企业战略、社会革新的著作和文章中。德鲁克认为,变革和连续性并不是一对矛盾体,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组织越接近变革的引导者,它就越需要保持内部和外部的连续性,越需要在快速的变革和保持连续性之间取得平衡。”<sup>[11]</sup>10 概而言之,缺乏传统的“在场”,创新成为无源之水,难以实现;没有朝向未来的眼光,所谓的创新只不过是原地踏步,其结果是既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也无法捍卫真正有价值的传统。

## (三) 创新性社会管理评价及其现实启示

社会管理创新是德鲁克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它反映了德鲁克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在避免暴力革命和撕裂社会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持续改良,为业已发生的变革寻求社会包容空间,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做好管理上的准备。

德鲁克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影响,善于从社会整体和历史长河中搜寻并确立管理的地位和管理学研究的坐标。管理者面临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人们实践的对象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社会变化、社会转折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与基础。德鲁克将管理创新视为对社会变革和挑战的一种必然回应,是管理的实践工具和有效机制。因此,德鲁克的创新管理,并非一时一地的偶然行为,而是融入社会管理方方面面的必然法则。

面临社会转型和激烈变迁,民众心理和社会心态往往流于浮躁与激进,极端化的思潮也因此容易找到滋生的社会土壤,稍有不慎,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和社会代价,这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的。社会管理创新不仅在实践层面上具有“工具”的意义,深入中国社会内核,它还具有“理念”层面的意义。打破业已形成甚至固化的利益格局,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共进,都需要拿出破解难题的勇气和智慧,甚至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气魄。

中国政府业已将社会管理创新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大幅跃升,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矛盾的累积,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不断调整,政府必须对社会管理方式进行变革。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长期以来积淀的一些老问题,也有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直面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展示社会的自我调整与自我修补的弹性与能力,是我们从德鲁克“创新性社会管理”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与此同时,要摒弃那种“一叶障目”、“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思想,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注重从文化传统、成功经验、“他山之石”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和信心,注重“在延续与变动间寻求平衡”,注重创新求变与社会承受度之间的平衡,如此,我们在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能有效维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是我们从德鲁克“创新性社会管理”中得到的另一个重要启示。

#### 参考文献:

- [1] 德鲁克 F P.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M]. 蔡文燕,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0-14.
- [2] 德鲁克 F P. 工业人的未来[M]. 余向华,张珺,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6-23.
- [3] 李信. 此时为什么突然兴起“占领华尔街”运动[J]. 中国企业家,2011(20):23.
- [4] 德鲁克 F P. 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M]. 李维安,王世权,刘金岩,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7-273.
- [5] 德鲁克 F P. 德鲁克日志[M]. 蒋旭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7.
- [6] 王玉生,梁燕. 德鲁克论组织的社会意义[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7(4):35-38.
- [7] 德鲁克 F P. 社会的管理[M]. 徐大建,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82.
- [8] 德鲁克 F P. 公司的概念[M]. 慕凤丽,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27.
- [9] 黄海鹰. 走出创新的误区[J]. 商业经济,2009(6):12.
- [10]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61.
- [11] 德鲁克 F P. 21 世纪的管理挑战[M]. 刘毓玲,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64.

[责任编辑:黄 燕]

## A Review of Drucker's Social Management Theory and its Reference for China

GONG Xiang-yang, LI Lan-fen

**Abstract:** Peter. F. Drucker's theory of social management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basic category of free functional community, ecologic social system, and innovative social management. It not only manifests his rich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training, but also his macro strategic management concept beyond the technical and tactic leve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rucker's social management theory le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project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current China.

**Key Words:** Drucker; functional social system; innovative social management; the theory of ecologic social system; innovation project of Chinese social management